

## ※周策縱教授紀念專輯※

# 學者詩人周策縱教授

洪銘水\*

周策縱教授是一個「左腳踏在傳統，右腳邁進現代」的知識分子、學者與詩人。

他於一九一六年出生在湖南祁陽縣一個鄉下的書香門第；父親周鵬翥是一位傳統詩人與書法家，所以他從小就熟讀古詩文及傳奇小說。十七歲以前連縣城都沒去過；直到後來要到衡陽考高中，才第一次出門。他父親請了兩個鄉下農夫擡轎子送他上路，在大雪中走了一整天，還住了一晚有臭蟲的小客棧，翌日天沒亮又起來趕路，才到達大營市的洪橋車站。他回憶說：「其實所謂車站就是一個小茅棚。我從來沒看到過汽車，當時往茅棚裏面一看，忽然看到前頭一個怪物張開兩隻閃亮的眼睛，原來就是一部公共汽車開著兩個大車燈。」<sup>1</sup>當時湖南舊學鼎盛，連中學的入學考試題目都是文言文；學生作答也是用文言文。考試的結果，他在報考的三個學校都考了第一名。他當然選了最好的「第五中學」（前清有名的書院「南路師範」）。開學以後，班上調皮的同學看他是鄉下來的，「有點土頭土腦」，就來欺負他。但是他的功課好，常常得到老師的稱讚，被選為「學生自治會」代表，班上又有一位祁陽同鄉大胖子自告奮勇保護他，從此就不再受欺負了。後來在反日運動的學生群眾大會上，從擔任文書記錄到主席臺上發言人，然後又參與編撰刊物、寫文章、草擬宣言等活動，已經把他鍛鍊成學生的鋒頭人物了！在中國遭受到日本的侵略（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件）之後，青年救國的志願高漲，使他投考國民黨的黨校——中央政治學校。其間，寫文章之外，每每以詩寄懷。顧頽剛曾評其詩

\* 洪銘水，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榮退教授。

<sup>1</sup> 見周策縱：〈初中點滴：初離家鄉和捲入反日運動——《棄園自傳》之一〉（丁愛真整理），收於周策縱著，陳致編：《周策縱舊詩存》（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頁327。

曰：「慷慨激昂，乃少年志士之詩也。」<sup>2</sup> 後來在抗戰期間，當了重慶市長的機要秘書，接著當了蔣介石侍從室秘書，可以說少年得志了。這一切大多歸功於他的家學淵源與詩文的才氣。

然而，他畢竟處於「五四」後續的新文化運動的衝擊中，逐漸受到胡適與蔡元培的影響。因此，在一九四八年仲春毅然決定辭官赴美留學。此舉改變了他的一生。至於他當時的心境，可以從他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於赴美的「美琪輪」(General Meigs) 上所寫的〈去國〉這一首詩得出端倪：

萬亂瘡痍欲語誰，卻攜紅淚赴洋西。辭官仍作支床石，去國終成失乳兒。

抗議從違牛李外，史心平實馬班知。吳門傾側難懸眼，碧海青天憾豈疑。<sup>3</sup> 從這首詩的首聯，可以看出他對戰後時局的亂象感到無奈、傷心出洋留學的心情。接著第二聯，引曾國藩〈漫與〉詩意以自況<sup>4</sup>。第三聯，借晚唐牛、李兩黨之爭以喻國共鬥爭，而自己過去參與抗日運動都在兩黨之外，其追求歷史真實的心，勿寧是史家司馬遷和班固都能瞭解的。末聯「吳門」句，當指在南京政府侍從室難有所指望，但豈可懷疑他對國族的「碧海青天夜夜心」？！據說，當時蔣介石不高興他離開侍從室，似懷疑他有離異之心，所以也不資助他（引述唐德剛教授語）。但他辭官而去留學卻得到顧頡剛的鼓勵。這首詩也可以說預告了他出國以後，要對歷史作客觀公允的詮釋，其發憤撰寫《五四運動史》的動機與使命感，也就可以理解了。

一九四八年夏天乘船抵美後，他曾在芝加哥打工，做過餐館的打雜工 (bus boy)，賺取學費；其間，寫了不少自嘲的打油詩。一九四九年九月中旬，雖然已得芝加哥大學的入學許可證，因不喜大都市，乃改赴安娜堡，進密西根大學政治系攻讀碩、博士學位。但當他向系裏表達要以「五四運動」作為博士論文題目時，卻遭到一位曾在北京住過多年的教授反對，並揚言要取消他的獎學金<sup>5</sup>。可是，他卻執意甚堅，終於在一九五五年完成了八百頁史無前例最長的博士論文：*The May*

<sup>2</sup> 同前註，頁 33。

<sup>3</sup> 同前註，頁 39。

<sup>4</sup> 出國前，他曾抄錄曾國藩〈漫與〉詩寄給他弟弟周策橫先生，詩中有「微官冷似支床石，去國情如失乳兒」。周詩句蓋脫胎於此。見同前註。

<sup>5</sup> 見周策縱：〈翻譯緣起〉，《五四運動史》（香港：明報出版社，1980 年），上冊，第 3-5 面（無頁碼）。

*Fourth Movement and Its Influence upon China's Social-Political Development*（《五四運動對中國社會政治的影響》）。從他的詩作後面常附的年月日及地點看，一九五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日、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他在華盛頓；一九五四年四月三日、五月十日、六月二日，他在哈佛大學。可見在撰寫論文期間他為了利用華府國會圖書館以及哈佛燕京圖書館的資料而短期駐足該兩地。

當然，還有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東亞圖書館。一九五六年元旦他在紐約與唐德剛和顧獻樸等友人相聚，曾寫了一首三百多行的白話長詩〈紐約〉，詩中末段有這樣的詩句：「啊，紐約，紐約，紐約！我不能再為你而歌。……我本來也想攀住你自由神的臂膊，用她那火炬來點起人生的烽火；誰知她的火炬快要被逆風吹沒，正要人們來把她救活。」<sup>6</sup>美國在五〇年代初經歷了極右派麥加錫清黨的年代 (McCarthy Era)；接著，又發生黑人反抗南方白人種族歧視的「罷乘汽車」運動。他當然站在同情弱者的一邊。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六日午夜，從密西根到哈佛的火車上，他寫了一首譴責美國南方種族歧視的詩，題曰〈美南訟〉("I Accuse the South")，並附長序介紹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人權運動的原委。詩共六首七絕，其五曰：「我亦東方有色人，未能高鼻與藍睛。若云帝子皆兄弟，卻恥朱門認弟兄。」其六曰：「雲慘風淒夜正愁，傍檐常為啟明憂。時人不識予心病，將謂偷詩記種仇。」<sup>7</sup>可見，他當時對美國也很失望。至於大陸的情況，則更不堪回首了！他一面做學術研究，寫嚴肅的學術論文，但一生不斷以詩寄懷，寫詩變成梁啟超所說「痛苦中的小玩意兒」。去年 (2006) 香港浸會大學陳致教授編輯出版《周策縱舊詩存》，收入上千首的詩，勿寧是一部「詩的自傳」。

就在美國五〇年代這個精神苦悶的時期，他完成了「五四運動」的論文。但心血沒有白費，他得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費正清教授 (Professor John K. Fairbank) 的賞識，聘為哈佛研究員 (Research Fellow, 1956-60; Research Associate, 1960-63)，並得費氏夫人 (Mrs. Wilma Fairbank) 協助專心修改他的博士論文成書準備出版。一九五七年七月五日深夜，他寫了一首詩，題曰：「修改拙作五四運動史英文稿將竣，念其後三十餘年時事之發展，因題一詩」：「千年禮教困英才，『五四』鐘聲動地來。德賽新潮掀巨浪，墨楊今怨激偏衰。群情每誤宜深省，眾志何堪

<sup>6</sup> 周策縱：《海燕》（香港：求自出版社，1961 年），頁 76-91。

<sup>7</sup> 周策縱著，陳致編：《周策縱舊詩存》，頁 72-74。

付曲裁。少日陳東多變節，書成擲筆費疑猜。」<sup>8</sup> 兩年之後，書稿經過文字修飾、打字編排、校訂、編索引等嚴謹的出版作業，終於在一九六〇年初由哈佛大學出版。在他一九五九年九月十日寫的〈自序〉裏說：「在中國近代史上，再沒有任何的重要事件像『五四運動』這樣惹起各種的爭論，這樣廣泛地被討論，可是對它的正式研究卻又是如此貧乏不足的了。對某些中國人而言，『五四運動』是中國新生和解放的標記；另一些人卻把它看成是國家民族的浩劫。……大多數西方人士，對這個運動的認識更是零碎而又不正確。由於上面種種原因，我覺得寫這樣一本書來確切記錄『五四』的史實，詳細檢討它的演變和效應，該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sup>9</sup> 至此，他從少年時代就想寫一本有關「五四運動史」的夢想，已如願達成，而且得到熱烈的迴響。

誠然，這本書一出版（英文原名：*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馬上就引起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捷克等西方學界的重視。很多重要學術刊物的書評對它做了高度的評價，其中《美國東方學會學報》(*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稱讚這本書是「研究今日已無可置疑的現代最重要的思想運動之一的鉅著。周策縱這一本材料充備的卓越著作，是任何一位研究現代中國的學者必不可缺的指導參考書。不但如此，這書把歷史細節和廣大的社會政治背景巧妙地交織起來，造成一種完美的有解釋性的關於中國的研究，實在是前所未有」<sup>10</sup>。還有，本書所引用的有關書目以及「五四」期間出版的各種書刊目錄和簡介，因為篇幅過大，又另外成書出版——《五四運動研究資料》（哈佛大學一九六三年出版）。稍後，這本《五四運動史》又由史丹福大學出平裝普及本，以利作為教科書平價出售。最後哈佛又收回自出平裝本，至今已出了好幾版。這是專門學術著作少見的出版現象。在美國可以說幾乎所有研究中國文史的教授與學生，無人不讀。可是在海峽兩岸的學界，反而鮮為人知！

一九六三年秋，他應聘到威斯康辛大學，先擔任訪問講師(Visiting Lecturer)；翌年，改為專任副教授；一九六六年升為正教授，成為威大東亞系的招牌教授。他

<sup>8</sup> 同前註，頁 83。

<sup>9</sup> 周策縱：〈原書著者自序〉，《五四運動史》，上冊，第 7 面（無頁碼）。原文見 Tse-tsung Chow, "Prefac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ix。

<sup>10</sup> 見周策縱：〈翻譯緣起〉，同前註，第 4 面（無頁碼）。

也從此一直留在威大，直到七十八歲才退休。其間，有很多研究生是慕其名而去的，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因為對「五四」時代的文學有興趣，但當時在臺灣是學術界的禁區，所以為了就教於周教授門下，我在一九六四年初春申請了威大，並幸運地得到該校「福特東亞區域研究獎學金」，於一九六四年秋季進了威大<sup>11</sup>。此後，陸續來了幾位東海同學（郭大夏、丁愛真、鍾玲），還有來自新加坡的王潤華和他詩人太太淡瑩，以及來自香港新亞書院的陳永明。我們後來組成一個翻譯小組<sup>12</sup>，逐章把《五四運動史》翻成中文，在香港的《明報月刊》分期（從一九七一年一月至一九七六年七月）連載了五年半。一九八〇年底才由明報出版社結集出了上半部。下半部則因翻譯成員畢業後都分散到各大學教書，而周教授也忙於《紅樓夢》研究與籌辦「國際《紅樓夢》研討會」，遲遲未能親自校訂而耽擱至今。前幾年（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底），他來參加我在東海籌辦的「戰後初期臺灣文學與思潮國際研討會」時，告訴我說《明報》出版社有意出一本圖文並茂的《五四運動史》全譯本，現在只等他把後半部校訂完畢，就可以出一部包括索引的完整本。但是，他當時的健康情況已經不太好，恐力不從心——現已成絕響，惜哉！

其實，臺灣的龍田出版社曾趕在《明報》版之前，在一九八〇年五月出版了一本署名楊默夫編譯的《五四運動史》，據周策縱教授在一九八九年給臺北桂冠版寫的「臺灣版自序」裏所說：「一九八〇年龍田出版社除了採用香港那些中譯外，又補譯了後半部，湊合出版，一九八四年還出了再版。不過也許為了禁忌，頗有刪節，並有許多改動、顛倒、和誤譯之處，第九章第五節『參加政治』部分全遭刪除。所以三十年來，國內始終未能見到一個中譯完本。翻譯者和我個人固然也要負一部分牽延的責任，但大部分還是由於國內環境的不順利。」<sup>13</sup>這本龍田版《五四運動史》一出，我的東海學長曹永洋就寄給我一本，並指出〈譯者序〉裏所列原來的六名譯者中，我的名子改成「洪銘勇」，我內人陳博文改成「陳博明」，至今不知何故？

<sup>11</sup> 詳情已在另一篇文章〈悼周師策縱教授兼懷往事〉有所交代，今不贅。該文刊於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文與哲》第10期（2007年6月），頁627-639。

<sup>12</sup> 當時參與執筆翻譯者有六位同學：丁愛真、王潤華、洪銘水、陳永明、陳博文、鍾玲。

<sup>13</sup> 周策縱：〈風潮與火種——《五四運動史》中譯本臺灣版自序〉，《五四運動史》（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89年），上冊，頁2。

在中國大陸，則遲至一九九六年才首次出現中文全譯本，即由周子平等五人合譯的《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據周教授說：「譯文很流暢，……只可惜人名和專門名詞頗有差錯。這一方面由於我未見到譯文的定稿；主要原因還是譯者未見到1963年哈佛出版我的第二本書《五四運動研究資料》之故。」<sup>14</sup>一九九九年北京大學歐陽哲生教授安排了北大一批年輕學者張靜等六位重新補譯了後半部，由長沙的岳麓書社出版了另一種全譯本。周策縱教授在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八日從陌地生（周教授給Madison的譯名）寄給我們一本，附筆曰：「此書後半部中譯尚準確，可惜後面刪去了索引。」原來我們六位譯者中，我內人陳博文就是負責「附錄」與「索引」的翻譯。周教授一直認為國人著書不附「索引」是一種缺陷。他甚至寫了專文〈論索引〉<sup>15</sup>。總之，這本英文的《五四運動史》，從一九六〇年哈佛出版至今將近半個世紀，仍然沒能出一本完美的中譯本。這本書撰寫的嚴謹，從每頁的腳註(footnotes)、每章的附註(notes)、圖表、附錄、索引等等細節，都可以作為學術專著的典範。

再者，他著書立論的精神與態度，就是他所說的：「我認為，中國史家有兩個優良傳統：一個是臨文不諱，秉筆直書；另一個是不求得寵於當時，卻待了解於後世。」<sup>16</sup>前者即董狐之筆，後者即司馬遷「藏之名山，以待來者」的態度。他認為我們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五四時代」的大前題，那就是「對傳統重新估價以創造一種新文化，而這種工作須從思想知識上改革著手：用理智來說服，用邏輯推理來代替盲目的倫理教條，破壞偶像，解放個性，發展獨立思考，以開創合理的未來社會。」他至少檢閱了「五四時期」六、七百種報刊才得出這樣的結論。他更進一步說：「後代的歷史家應該大書特書『五四』這種只求訴諸真理與事實，而不乞靈於古聖先賢，詩云子曰，或道德教條，這種只求替自己說話，不是代聖人立言，這種尚『知』的新作風，應該是中國文明發展史上最重大的轉捩點。」<sup>17</sup>一九七九年，他在香港參加紀念「五四」六十週年時寫過一首詩：「從古自強依作育，至今真富

<sup>14</sup> 周策縱：〈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岳麓版《五四運動史》中文譯本著者自序〉，《五四運動史》（長沙：岳麓書社，1999年），頁1-2。

<sup>15</sup> 見周策縱：〈論索引〉，《紅樓夢案——棄園紅學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93-198。

<sup>16</sup> 周策縱：〈認知、評估、再充——香港再版自序〉，《五四運動史》（岳麓書社版），頁7。

<sup>17</sup> 同前註，頁12。

在求知。百年以後誰思此，舊義新潮兩不移。」他進一步解釋說：「我經過多年考慮，和許多前輩一樣，認定富強之道，首先要靠發展教育。但我更堅信，真正的『富』乃是『知識』。從這方面說，『五四思潮』實在有合於未來潮流之處。」<sup>18</sup>回顧海峽兩岸也不知舉辦過多少次紀念「五四」的會，但卻絕少聽到像周策縱教授這樣的聲音。

周策縱教授另外一個學術的里程碑，應該要算他籌辦「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的創舉。

《紅樓夢》是中國文學遺產中的一部奇書。兩百年來不知吸引了多少文人學士對它加以賞析評斷，其中包括新舊文人、詩人、學者、史家、小說家、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都曾對它發表過看法。有關研究專著成書者不下三百，論文則以千計。再者，半個多世紀以來，它已經被翻譯成十幾種外國語文，已經走出國門，飄洋過海與世界交流了；因此，也可以說它已經變成世界文學遺產的一部分。透過世界之窗，《紅樓夢》是代表中國精緻文化的風景。因此，把《紅樓夢》放在國際的舞臺上來展示，有其特殊的意義。周策縱教授花了三年的心血所籌備出來的，在陌地生威斯康辛大學召開為期五天（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六至二十日）的「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是史無前例的。

另外一層意義是海峽兩岸隔絕未通，美國作為第三地的東道主，反而是最適當的平臺了。這一次會議參加的代表有來自美國、中國大陸、臺灣、香港、英國、加拿大、日本、新加坡和韓國等九個地區，分別來自三十四間大學、三個文化學術機構和五個新聞媒體。宣讀論文有二十五篇中文、十七篇英文，依論文的性質分成十組：（一）評論檢討，（二）版本與作者問題，（三）後四十回問題，（四）曹雪芹的家世、生活、和著作，（五）主題與結構，（六）心理分析，（七）情節與象徵，（八）比較研究與翻譯，（九）敘述技巧，（十）個性刻劃<sup>19</sup>。從這些論文的多樣性與國際性，從研究作品的文本延伸到版本、作者、家世、時代與文化等外圍

<sup>18</sup> 同前註，頁 15。

<sup>19</sup> 其他細節，請參見周策縱：〈多方研討《紅樓夢》——《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論文集》編者序〉，《紅樓夢案——棄園紅學論文集》，頁 11-17。另外，與陳永明合編的《首屆國際紅學會議記盛》已成稿，將出版。中文發表的研討會論文，已由香港中文大學於一九八三年結集出版。

的研究（簡言之，即周汝昌先生所說《紅樓夢》的「內學」與「外學」），也可以說明為甚麼《紅樓夢》的研究已演變成「紅學」研究的原因了。

在與會的中外學者中，最引人矚目的莫過於周汝昌先生。他是繼胡適以後，最著名的「紅學」大師。他在一九五三年出版的《紅樓夢新證》成了考證《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家世的奠基石。此外，他對曹雪芹的文學評價也超越了胡適與俞平伯。他在《獻芹集》裏有針對性地為曹雪芹辯護說：

曹雪芹，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家門顯赫，不是紈袴膏梁；文采風流，不是江南才子（「唐伯虎型」）。卻召辭榮，不是山林高隱；詩朋酒侶，不是措大窮酸。他異乎所有一般儒士文人，不同於得志當時、誇弓耀馬的滿州武勇。他思想叛逆，但不是「造反者」；他生計窮愁，但不是叫化兒。其為「類型」，頗稱奇特；欲加理解，實費揣摩。結語又說：「雪芹不幸四十即死。但『這樣的人，規矩是不死的』（雪芹書中語）。他的精氣長存，輝光不沒，照映著我們祖國的古今藝苑，人間的中外文林。他是我國近代史上當之無愧的啓蒙運動先驅者，偉大的思想家。<sup>20</sup>

在這一次研討會中，他提出很長的論文——〈紅樓夢全璧的背後〉，主要論點認為後四十回的續作有違原作者曹雪芹悲劇的立意，並認為背後有身為相國的和珅揣摩上意，主導將有礙語的《石頭記》「刪改抽撤」而成程偉元和高鶚的一百二十回《紅樓夢》，以此進呈乾隆皇帝而得御賞。這幕後的陰謀，正符合乾隆時代整理《四庫全書》而同時做思想檢查，進而篡改或禁毀書籍的手法<sup>21</sup>。當然，這個論斷在「紅學」界仍有爭議，此不贅。周汝昌先生，看起來弱不禁風，但說起話來，語帶感情，聲音宏亮，足以震懾全場，極富說服力。他的書法，瘦勁俊逸如其人，別具一格。另外一位著名的「紅學」家馮其庸也是書法家，筆鋒挺拔舒暢如行雲流水。我在大陸旅行時，常可看到他的題字墨跡。他當時是人民大學教授、中國紅樓夢學會會長及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現為中國國學研究院院長），著作甚豐，是當今的「紅學」大家。我近十年來在東海開「紅樓夢」的課，都採用他的《紅樓夢校注》。

在這一次大會上，有人戲稱周汝昌為「東周」，而周策縱為「西周」。當然這

<sup>20</sup> 周汝昌：〈橡筆誰能寫雪芹〉，《獻芹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7-28。

<sup>21</sup> 周汝昌：〈《紅樓夢》「全璧」的背後〉，同前註，頁483-532。

一次的大會，可以說「紅學」名家雲集。大陸代表還有陳毓寵，臺灣有潘重規，日本有伊藤漱平，英國有霍克思 (David Hawkes)，加拿大有葉嘉瑩，美國有余英時、趙岡、唐德剛、李田意、余國藩、李歐梵、韓南 (Patrick D. Hanan)、芮效衛 (David T. Roy)、白先勇、王靖獻等，僅舉其要者。開幕當天，周策縱教授發給與會學者一首散曲〈紅樓夢外一支：〈血淚書〉——為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作〉：

字字鮮紅血淚潮，把十年生命都消磨了。畢竟有幾度青春年少，怎禁得，儘  
拼換這風情月債，魄蕩又魂銷。桃紅柳綠妖嬈，風流人物癡還俏，一箇箇活  
來嘴舌不輕饒，眉杪眼角爭啼笑，刻劃出腐心利欲，迫人權勢鬼嚎啕。只落  
得個荒唐夢幻，紅樓白雪路迢迢。儘叫人從頭細味把金樽倒，好一似大觀園  
重訪了幾千遭，想一想悲歡離合，炎涼世態，便古往今來也只共一朝。回頭  
看紅學轟轟烈烈，更只是千言萬語盾與矛，無窮無盡的筆墨官司總打不消。  
沒奈何，且拍案狂歌當哭，呼朋引類盡牢騷，豈道是召一次國際擂臺趁熱  
鬧，實爲了文章美麗，學術崇高，還應叫那全世界的蒼生驚曉，一道兒來品  
賞其中妙。<sup>22</sup>

周汝昌先生在會後向大陸讀者報導的文章〈陌地紅情——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詩話〉裏，還為這一支散曲做了補充說明：「《紅樓夢》是一篇藝術奇蹟，國際紅學會也是一篇藝術奇蹟，我為此語作證，即舉大會主席周策縱教授的〈紅樓夢外一支：〈血淚書〉——為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作〉。這是一支散曲，所謂『外』，是戲言《石頭記》原書本有《紅樓夢曲十二支》，所以是其外的又一支曲。」結語又說：「我讀至末句，不禁為之拍案叫絕，我們中華民族的這部《紅樓夢》，實在值得『還應叫那全世界的蒼生驚曉，一道兒來品賞其中妙』！」<sup>23</sup> 誠然，周策縱教授這一支散曲，細讀之下，幾乎句句都有來歷，道盡了這部小說所引起的風風雨雨的歷程。

在同一篇文章裏，周汝昌先生還介紹了我在會中所寫的一首絕句〈六月十九日晨起陰雨濛濛值逢雪芹生日有感〉：「詩鬼未夭兩百歲，吟風寄雨過西東。紅樓尋夢夢不斷，陌地生情情也紅。」並做了補充說明：「他還為詩句和題目設了三條小

<sup>22</sup> 見周策縱著，周策橫抄：《白玉詞》（陌地生：棄園藏版，1991年），頁10-11。又收於《周策縱舊詩存》，頁202-203。

<sup>23</sup> 見周汝昌：〈陌地紅情——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詩話〉，《獻芹集》，頁556-557。

注，在『生日』下，注云：『據張加倫先生考證。』因為大會論文有一篇就是〈曹雪芹生辰考〉，主張雪芹實生於雍正二年五月初七日，而今年的首屆國際紅學大會，適然巧值此時。他為『詩鬼』作注云：『敦誠以詩鬼李賀比曹雪芹。』為『夭』字作注云：『周汝昌先生認為曹雪芹未過中壽，故謂夭。』當然，我還可以代他作一條補注：陌地生，是地名 Madison 的音譯，亦即大會的東道主人威斯康辛大學的所在地。不待多言，洪銘水教授正是妙語雙關，巧為運用。我誦讀此詩，覺其筆致不凡，深有意趣。結句尤見其深情別具。大會閉幕後，他以一日的時間來陪我們同遊大湖之濱，種種情意，我才體味到他對來自祖國的出席者是懷著何等的感情，也才更理解他的詩句的深度。」<sup>24</sup> 我這首小詩，實在不算甚麼，但確是應景寫實；能得到周汝昌先生的嘉許，實出意料之外。

至於周策縱教授的「紅學」研究，也有很長的淵源。他在高小的時候第一次看《紅樓夢》，只看了前面一、兩回就看不下去了；因為看不太懂，覺得沒甚麼趣味，不像《西遊記》或《水滸傳》。後來上了初中，聽一位國文老師用衡山土話唸「劉姥姥進大觀園」，唸得津津有味，引起了他重新閱讀這部小說的興趣，並為小說人物作了二十多首的「題詠」。可以算是他平生參加「紅學」行列最早的一次<sup>25</sup>。再來就是一九四八年乘「美琪輪」出國時，在船上無聊，與同船朋友搶著看《紅樓夢》。但是進了密西根大學以後，大部分的心神都花在「五四運動」的研究與出版。一九六〇年元旦，他與唐德剛、顧獻樸等人在紐約創辦《海外論壇》月刊，得到胡適的支持，為他們雜誌寫了〈所謂「曹雪芹小像」之謎〉；他也草擬了一份「《紅樓夢》研究計劃」，打算從各種角度作綜合的檢討。在哈佛同事中也有海陶瑋 (James Robert Hightower) 和楊聯陞教授，相與討論。他這個時候，就發表了〈論鳳姐的「一從二令三人木」〉。接著，他計畫要在《海外論壇》上繼續胡適的研究，並擴充王國維的文學評論方向<sup>26</sup>，發展新紅學。可惜，胡適不久就去世，雜誌也停刊了。

一九六三年周教授受聘到威斯康辛大學任教，我一九六四年秋季進威大，先修

<sup>24</sup> 同前註，頁 552-553。

<sup>25</sup> 周策縱：〈初中點滴：初離家鄉和捲入反日運動——《棄園自傳》之一〉，《周策縱舊詩存》，頁 344-345。

<sup>26</sup> 他一九七二年曾出版《論王國維人間詞》（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72 年）。

他的「治學方法」(Research Method and Source Materials)，然後才修「《紅樓夢》研究」的課。我記得好像是在周教授得古根漢獎金周遊世界漢學中心，一九六七年回來以後，才選了這門課。想起我閱讀《紅樓夢》的興趣，也一樣受了國文老師的影響。不過，不同的是我高一的姬安蓮老師是用道地的「北平話」唸的「劉姥姥進大觀園」。後來我在別的課堂上竟偷看起《紅樓夢》來，還被級任老師發現了！這裏，不禁想到周教授就讀衡陽第五中學時，還發生過一件有趣的插曲。且聽周教授的描述：「有一位金先生，年紀最輕，是北大，或北師大畢業的。一口捲舌音，兒呀兒呀的，我們聽不懂他的北京話。上了幾堂課，大家聽不懂，要趕他走。校長說他講的是最標準的國語，我們都應該學。可是他的舌頭捲得那麼厲害，我們實在無法聽懂，結果還是把他趕走了。想起來真冤枉，又好笑，我們頭一次竟用不成理由的理由把老師趕走了。」<sup>27</sup>看到這裏，我不禁慶幸，好在姬安蓮老師沒到周教授的湖南學校去教書，不然的話，會不會也跟她的「北平」同鄉一樣要被學生趕走，那可真正冤枉了一位絕美的老師了。

一九七一年一月十六日，周教授應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潘重規教授之邀，為「《紅樓夢》研究」展覽會演講〈紅樓夢研究在西方的發展〉，當時在座的有梅貽寶、唐君毅和我東海的老師徐復觀教授。三十多年來，周教授對《紅樓夢》的研究，時有創見。文章包括關鍵性的研究方向與態度的討論、新紅學的得失、對胡適紅學研究的歷史評價、曹雪芹家世政治關係的溯源等等都有精密的考證。二〇〇〇年出版的《紅樓夢案——棄園紅學論文集》收有二十七篇文章，值得讀者仔細品味。

另外，周教授長期以來對甲骨文有興趣，一九八六年由臺北聯經出版了《古巫醫與「六詩」考——中國浪漫文學探源》，探討古巫對醫藥與詩歌的貢獻，尤其闡釋了巫提倡兩性自由，對陳、齊、鄭、衛和楚國文化以及浪漫文學的影響。所謂「六詩」原指六種詩體，進而說明賦、比、興、風、雅、頌的原始意義。這本書對中國古代醫學史、思想史、文學史、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史、歌舞與戲劇的演變等，都有新的假設，發前人所未發，可謂一個融會貫通的研究成果。早在一九六八年為了追溯中文「詩」這個字的原意，他寫了一篇五十八頁的英文論文稿 “The

<sup>27</sup> 周策縱：〈初中點滴：初離家鄉和捲入反日運動——《棄園自傳》之一〉，《周策縱舊詩存》，頁329。

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ord *Shih* (Poetry)" 發表在他主編的 *Wen-lin: Studies in the Chinese Humanities* (《文林》) 論文集中<sup>28</sup>，也是一貫地展現了他旁徵博引，窮追到底的治學功夫。在一九八九年 *Wen-lin* 第二卷中，他又用英文發表了墨家源流的新理論 "A New Theory on the Origins of Mohism"，把墨家與西方勞動階級的工會相比較，得出新的詮釋<sup>29</sup>。

總之，我個人覺得周策縱教授的治學態度與方法，最值得我們學習的是永遠在尋找新的議題、新的觀點；對問題，先從文化的宏觀視野去探索其意義，再以微觀綿密的步驟進行考察。再者，他一生追求學問的執著，也是值得我們效法的。我作為他的一個早期學生，一方面覺得很幸運，另一方面也覺得很慚愧。在臺灣，周策縱這個名字，鮮為人知。他的中央政治學校的同學，可有不少人在臺灣當了大官。但這些已經老早跟他毫不相干。一九九一年，我們一道參加了新加坡大學林徐典教授籌辦的「漢學的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他為我題了一幅字在圓心的冊頁上，是抄錄漢人桓寬《鹽鐵論》和王充《論衡》中引用過的孔子說的兩句話。現在就用它作為結語並以之自勉：

詩人疾之不能默

丘疾之不能伏

<sup>28</sup> Chow Tse-tsung,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ord *Shih* (Poetry)," *Wen-lin: Studies in the Chinese Humaniti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68), pp. 151-209.

<sup>29</sup> Chow Tse-tsung, "A New Theory on the Origins of Mohism," *Wen-lin*, vol. 2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9), pp. 123-151.